

自然史、人類學 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 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

陳偉智**

摘要

本文探討近代種族知識在臺灣的展開。從近代自然史成立以來，種族成為以全世界人種為普遍參照架構的一個人類社群分類的全球概念。對於異文化知識生產的學科發展上，由自然史逐漸發展成人類學。而種族知識建構，也從種族型態的描述，逐漸發展到人群單位的分類，乃至其社會屬性的分析。種族知識建構的參與者，或有個別目的，如傳教、商業、與統治，卻不約而同地透過種族概念，或是延伸的社群單位概念，再現所遭逢的異文化社會。臺灣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透過西方博物學家、傳教士、以及日本人類學家之手，將地方社會紛雜的人類社群現象，分類編入種族的全球普遍性知識架構中。種族概念的科學宣稱，排除了其他社會再現的地方知識。人類社群的近代知識建構，即便在其他社群分類概念取代種族後，可辨識的、互相區隔的社群單位，形式上仍繼續留存。

關鍵詞：自然史、人類學、馬偕、伊能嘉矩、田代安定、森丑之助、種族、社會分類、知識建構、全球概念

*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的審查意見與修改建議，以及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在檔案使用上的協助。本論文先前曾以比較短的不同版本發表於 2001 年「日臺青年臺灣史研究者交流會議」、以及 2009 年臺灣文化研究學會年會「根源與路徑」。在本文的書寫與修改過程中，受惠於吳密察、張隆志、溫浩邦等師長學友，以及會議參與者的寶貴批評與建議，謹此致謝。

** 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來稿日期：2010 年 2 月 5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4 月 20 日。

- 一、問題提起
 - 二、伊能嘉矩的臺灣人類學研究（1895-1900）
 - 三、種族的知識建構
 - 四、種族知識的科學性宣稱
 - 五、結論：「種族」在臺灣的歷史性
-

一、問題提起

1898年4月，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由當時臺灣總督府理蕃行政相關官員在臺北組成的蕃情研究會發會式上發表了〈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臺灣各蕃族開化之程度）¹一文，作為該會的創會學術演講。在文中伊能嘉矩依據其自1895年11月到臺灣以來的調查資料，其中包括於1897年所進行前後192天的全島調查，提出了全部臺灣原住民的種族分類，並且在比較民族學的視野中，討論各個種族的進化程度。伊能本人於1895年來臺前，曾發表一篇渡臺宣言〈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在其中提出了將至臺灣進行科學的種族分類研究之企圖，以及來臺後，1895年12月與博物學家田代安定在臺北組織臺灣人類學會時所揭櫫的「人類的理學研究」研究計畫，至此有了初步的結果。

在蕃情研究會發會式的演說中，伊能批評了先前關於臺灣種族的兩個既有的分類：「固有的中國人的分類知識與西洋人的記述」，也就是日本殖民前清代臺灣的官方檔案與方志文獻中的「生番與熟番」的分類與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人對臺灣的種族分類。²對於西方人的分類，伊能特別指明兩個人的說法，一是George L.

¹ 伊能嘉矩於1898年4月23日的演講紀錄，見〈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蕃情研究會に於ける伊能の説）〉，《臺灣新報》486，1898年4月26日，第2版、《臺灣新報》489，1898年4月29日，第2版。

² 日文文獻原文之「支那」與「支那人」，本文依據文意脈絡翻譯成「漢人」、「中國」、或「中國人」。另外，清代或中文文獻，提及原住民時，常用「番」，日文文獻則多用「蕃」。本文原則上保持原來文獻使用文字。

Mackay的，一是George Taylor的。³ 對於固有的生番與熟番分類，伊能認為是清帝國基於政治上蕃人歸化與否而來的分類概念，是政治的行政概念而非科學的種族知識。至於Mackay與Taylor，伊能則指出他們其中一個所提出的「生蕃、熟蕃、平埔蕃與南勢蕃」種族分類，偏重於臺灣北部（Mackay）；而另一個提出的「排灣、阿美、知本與平埔」，則是偏重於臺灣南部（Taylor）。⁴ 進而批評他們的分類知識雖然不是政治上的分類，但一方面各有所偏重於臺灣南北兩端，並非全體性的臺灣種族分類；同時他們也受到了清帝國的分類影響而有所混淆，因此也並非是科學的分類知識。「科學」的宣稱，用伊能自己的語彙來說是「理學」或是「學術的」探究，成為伊能評價先於其前的各種分類知識的一個標準。

伊能嘉矩的學術的臺灣種族分類知識，事實上是以西方近代以來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作為普世皆準的知識參照，其中又特別是從人類種族的自然史這個知識傳統至十九世紀所發展出來的學術建制知識：民族學（Ethnology）、或人類學（Anthropology），作為伊能所言的「人類學」種族研究的知識建構參考架構。種族知識基本上是作為一個近代以來西方近代性構成一部分的各種普世性有效宣稱的知識之一的自然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將礦物、動物、植物普遍地、盡可能窮盡地分類，並將世界各地的種種事務納入普遍的分類體系架構中。這是自自然史學者Linnaeus以來的自然史的知識想望。⁵ 其中將人類自己亦包攝在內的，伴隨著西歐諸帝國海外擴張與各種人類的海外遭逢，在Mary Louise Pratt所言的「環球意識」(planetary consciousness)中，⁶ 逐漸形成的人類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humanity)近代知識。其效果則是並時化(synchronizing)全世界的人

³ George L. Mackay 為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士，一般也稱之為馬偕牧師，於 1872 年抵臺傳教近 30 年，於 1901 年去世。除教會工作外，亦從事臺灣的自然史研究。George Taylor，英籍清帝國海關關員，及皇家地理學會會員，1882-1887 年於南臺灣管理燈塔，並從事民族學調查。Mackay 的臺灣自然史調查，見 Wei-chi Chen (陳偉智)，“The Natural History of Formosa is as Yet an Unwritten Book”: Missionary, Natural History and Local Knowledge in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0th Annual MAR/AAS conference, Slippery Rock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2001. 關於 George Taylor 的臺灣自然史報告，見 George Taylor, *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and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9).

⁴ George Taylor, “Formosa: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the Island and its Aboriginal Inhabitan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1: 4 (April 1889), pp. 224-239.

⁵ 關於西方自然史知識傳統的形成與發展，見 Paul Lawrence Farber, *Finding Order in Nature: The Naturalist Tradition from Linnaeus to E. O. Wils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⁶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16-37.

文差異，依據體質特徵、膚色、語言、風俗習慣、社會組織等原則，分類了人類社群，一方面形成了描述性的博物學知識生產中「種族」的範疇；另一方面，也提供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文明化任務的種族主義意識型態知識基礎（「白種人的」負擔，或是隨後日治初期殖民者所言的「黃種人的」負擔）。而自然史博物學時代的種族知識建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也隨著知識生產的專業化，以及知識生產部門分工學科界線建制化的形成過程，在劃分出來的人種學、民族學或人類學的學科項目中，進一步的發展。⁷ 十九世紀下半葉，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天皇詔書「五條誓文」提到的「廣求知識於世界」，也以帝國大學的建制，引進了西方截至當時為止各種建制化的學術知識，其中也包括了在1893年在東京帝國大學內成立的人類學講座。這些新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中，建立自己合法性的根據是理性與科學性的宣稱。⁸

有趣的是，伊能的科學宣稱，被他批評的 Mackay 在稍早時也曾經宣稱過。同時，弔詭的是，伊能所建構的學術的種族知識，接下來在十幾年後，被與他同年來臺但稍晚展開其人類學調查的森丑之助，形容為非學術性的作品，至多只是文獻資料的整理而已，而與實地調查無涉。伊能於 1898 年 4 月的論文在這個脈絡中，也因此可以看成是關於近代的種族知識，對臺灣複雜人文現象的科學知識再現的一篇重要文獻。從相關的批評與論爭中，使用學術的語言成為一種對於知識合法性的宣稱與文本內容合理性的討論標準。可以說，臺灣近代的種族現象的知識建構，是在使用這種科學新語言中展開。

從前後關於臺灣的人種研究誰最「科學」，或者誰的臺灣的種族知識是最「學術的」的批評，恰好在論爭中呈現一個相當類似的知識系譜：從 Mackay 到伊能到森，一波波的「我比前人更學術」等論述構成中的自我宣稱，其所內涵的排除他者論述合法性的邏輯，是一種事實或是一種論述策略？如果是事實，又是那一種

⁷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ing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2.

⁸ 理性與科學性的原則，也反映在對於一些固有知識生產部門的改造上，比如「歷史」。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在設立旨趣上，即以科學化的歷史學為目標。這裡的科學化歷史學主要指的是方法上的史料批判以及實證邏輯。有趣的是，日本近代科學史學建立之初，關心的歷史學問題，也是「種族」史。不論是在「國史」或是「東洋史」，關心的問題主要是日本或東亞歷史上的種族互動關係。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種族」也可以讀成「文明」的同義詞。探求「種族」起源與互動，即是在探求「文明」的起源與歷史上各文明之間的互動關係。日本近代歷史學的發展，參見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東京：青木書店，1976）；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性質的事實？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臺灣種族的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會不會只是重新發明了一種新的社會事實呢？而一個全面性的臺灣人文現象的知識解釋，如伊能的業績，同時也是建立在科學性宣稱上的排除、壓抑、改寫其他類型知識的競爭效果上。伊能的科學性的知識宣稱當然在論述形構上具有排除與畫界的作用。如果種族知識是近代知識的一部分的話，那麼，清代的諸種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書寫，是何種知識呢？只是如伊能等近代西方種族知識的代理人在知識生產中所批判的文獻資料與排除的舊論述而已？

在本文中，筆者將以伊能嘉矩為討論的出發點，討論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近代的種族知識在臺灣的形成。近年來探討諸如殖民主義與知識生產、殖民主義的文化史等相關的議題，吸引了許多學者的興趣。同時，關於日本殖民主義的新文化史取徑的研究，也累積不少成果。日本的殖民地人類學，更是一個形成中的跨國共同建構的研究領域。⁹ 相對於目前以探討殖民主義與知識生產的共構關係或是共謀關係，或是強調日本學者在帝國脈絡下或是殖民情境中的曖昧處境的這些成果，一個未被進一步反省的議題是，雖然是從批判既有的學術知識建制出發，但是到最後，很弔詭的，就如同殖民地時期的學術政治一般，「日本」這一個符號還是被當成了發動者，一個隱身的集體作者。從批判日本出發，最後回到日本，以否定的方式重新鞏固「日本」。因此，本文的討論策略，是將「種族」知識，視為在近代產生出來的，並流通於全世界的全球概念（global concept）之一，在地方脈絡下的具體展開。¹⁰ 這樣的立場，並不是否定殖民者或是相關學科知識的個

⁹ 比如，日本岩波書店企畫出版的八卷本《「帝国」日本の学知：岩波講座》（東京：岩波書店 2006），即是近代日本帝國文化史取徑的代表作品。針對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的研究，這十年來也產生許多日文、英文、中文的成果，幾乎可以看成是一個同時的、跨國的共同構成的新領域。相關的研究舉例而言，如松田京子、Paul Barclay、小熊英二、坂野徹等。

¹⁰ 關於「全球概念」的詮釋——文化史分析，Andrew Sartori 曾以「文化」（culture/ kultur）為例，討論此一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不論在西方或是非西方，殖民母國或是殖民地，雖然各地所使用的語言意符跟發音不一樣，但幾乎是全球流通的概念，指涉在不同脈絡、不同目的下，用來表述一種「主體的獨立自主性」（subjective autonomy），要求「人的主觀能動性」（human agency）的宣稱，其全球化的產生過程（globalization of culture-concept）。見 Andrew Sartori, “The Resonance of ‘Culture’: Framing a Problem in Global Concept-Hist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7:4 (2005), 676-699。相對於 Sartori 討論的「文化」，「種族」是一個更早的全球概念。不論「種族」或是「文化」，即便各地的行動者進行主觀性的、強調特殊性的闡釋，但是由於這些全球概念，同時可以用到對其他人類社群單位上，因此使其在形式上具有了普遍性的意涵。而這些全球概念的流通，也使各地與各種不同語群，產生可以對譯的本土翻譯語，不論是借用舊字組合成新詞，或是創用新詞。

別生產者的角色，或是跳過殖民主義具體的歷史社會脈絡；如同本文分析顯示，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下，他們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介者。相反的，本文試圖透過對這一個具體指涉地方社會範疇的，但同時又是一個全球概念，其在臺灣展開的歷史分析，打開前述的以批判殖民者開始，卻弔詭地鞏固殖民者的分析陷阱。

在本文中，種族知識是指西方傳教士、博物學家、日本人類學家等人使用的「人種」、「種族」、「race」等詞彙所表述的知識的綜稱，對於建構這種知識的學科，他們或稱為「ethnology」（Mackay）或「人類學」（伊能嘉矩）。文中先討論從1895年到1898年中伊能嘉矩關於臺灣的種族知識的建構過程，從對於「生熟蕃」議題的辯析論詰，到「平埔蕃」的討論，到最後提出了全臺「漢人之外」的人類種族分類與進化位階的排定。伊能將這種知識稱之為「人類學」或是「人類的理學研究」。其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辨明各個種族的文化特質，並進行島內與周邊島嶼的種族的比較研究。以伊能嘉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1895年在來臺宣言〈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中的提問：「此（臺灣）不同種族之固有體質、心理、土俗、言語之現態如何、相互之關係如何，而且與其附近海岸及島嶼之諸種族之關係如何，實當今未知之疑問。」¹¹ 1898年4月，在蕃情研究會發會式上的報告，則是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全臺種族分類的回答。

接著本文將伊能的知識建構，放在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各種不同的種族知識論述實踐的系譜中，討論「種族」這種概念作為一種近代性的知識範疇，在臺灣的展開。如同伊能在來臺宣言中的另一段自勉：「余嘗有志於修人類學，數年以來致力於斯學之研磨，久期於闡明亞細亞各種人類之系統關係，聊資裨補學界於萬一」中所呈現的問題意識，伊能以西方近代的種族知識的語言，將臺灣的多元複雜的人文現象，翻譯整編入這個知識系統內。以種族的知識概念、語彙，編入「亞細亞各種人類之系統關係」所包含在內的人類的自然史研究的知識裝置，伊能並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後集大成者。十九世紀中葉與達爾文齊名的英國博物學家Alfred Wallace曾在 *Island Life*（島嶼生命）一書中感嘆臺灣的自然史是一個「未知領域」（terra incognita）。Mackay也曾說過臺灣的自然史是一本「未寫之

¹¹ 伊能嘉矩此一渡臺之前的宣言，後來收入於1902年出版的《臺灣志》序言「小引三則」中。見伊能嘉矩編，《臺灣志》（東京：文學社，1902），頁1-5。〈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中文的翻譯，則引自吳密察，〈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大學圖書館》1:3（1997年7月），頁4-23。

書」(unwritten book)，伊能來臺則是欲探究「未知之疑問」。這些「未知」、「未寫」之疑，並不是意味著之前沒有關於臺灣的紀錄與知識，而在於知識的性質不同。¹² 筆者將討論這些種族知識的論爭並不是「誰最學術」的問題，也不應該被看成是西方或是近代的理論知識對於臺灣本土事實的發現。這是一個從傳統天朝文化主義下的文明—政治範疇(文／野—人／番之別)，到近代理性知識普遍性宣稱下的生物—社會範疇(自然史體系中的人類種族單位)的貫時性的轉變。這個轉變一方面是歷史概念的斷裂與創生，另一方面，同時也是並時性的透過在地的代理機制與中介者作用，全球概念的地方展開。臺灣的種族化在知識上的形成過程，似乎是一個結合了孔恩(Thomas Kuhn)曾指出的帶有時間上的斷裂性質的知識典範轉移與薩伊德(Edward Said)所言的跨越空間的知識生產的理論旅行的機制，透過博物學家、傳教士、人類學家等現地的代理人的中介，選擇性的接合本土事例，創造出新的社會範疇。¹³

本文主張，我們應該將種族這種社會範疇與相關的知識，視為近代性的知識裝置之一。其在臺灣展開的過程，是從一開始的建構知識，最後變成社會事實的論述實體化或物質化的過程。它需要被歷史化地分析，並探究其如何成為我們的基本社會分類範疇。在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臺灣的近代性是在這樣的「知識／事實」轉換、創生的過程——借用劉禾的話來說，東亞世界在近代的「跨語言實踐」——中展開。¹⁴ 透過對此一問題的討論，本文亦側面地將臺灣史的歷史書寫問題化。我們必須將內含在我們書寫中的「概念—社會」語言實踐，或是將習焉不察的社會分類範疇加以歷史化。他們並不是中立、客觀的學術概念，而是某種知識型的展開延伸。這樣的分析，同時也將指出種族或是其他後來的延伸概念的歷史性。

¹² Alfred Russel Wallace, *Island Lif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8[1881]), p. 365; 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5). Mackay 的原文是“the natural history of Formosa is as yet an unwritten book,” p. 48.

¹³ 筆者並不認為這些主導性的近代概念在臺灣形成之後，就取代了固有的社會身分範疇，包括傳統帝國在邊區行政中創造出來的族群政治範疇，以及臺灣民間社會在日常生活中歷史地累積而成的，意識到的或是無意識的社會分類。這些既有的政治、社會範疇仍同時並存著。但是主導性的概念之所以是主導性的，是因為作為近代性的一部份，其科學知識的宣稱與其他近代制度(比如國家與大學)結合產生的效果。

¹⁴ 見 Lydia Liu (劉禾),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4.

二、伊能嘉矩的臺灣人類學研究（1895-1900）

1895年12月，渡臺的東京人類學會會員伊能嘉矩與田代安定，在臺北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¹⁵ 臺灣人類學會在成立宣言中規定以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第1條）為宗旨。至於什麼是「人類的理學研究」呢？在本文附錄一「臺灣人類學會暫定規則」附則第一項的說明是：¹⁶

從來於臺灣雖然分人類為漢人及熟蕃、生蕃三者，但是除漢人之外，僅視為異種人類，概不過從華夷之名，中國古來習慣稱呼而已。故所謂熟蕃生蕃不可直接作為學術上名辭，須依據今後的研究結果，始能定種族為何（或屬同一種族，或分為不同的異種族，或兼有之）。

在「臺灣人類學會暫定規則」附則的說明中，首先認為當時臺灣固有的人種分類法：「漢人、熟蕃、生蕃」，只是傳統中國「華夷之別」習慣下的人種分類而已。也因此除了漢人之外，將其他人種俱視為「異種人類」。這種「固有分類法」在伊能眼中並不能當成學術名辭，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以確定種族分類。在這裡所謂的適當「學術名辭」的確認、進一步的研究與確定種族所屬，即是當時伊能所言之「人類的理學研究」的目標。坪井正五郎的調查「種種人類之體質風俗習慣」是日本人類學研究者任務之一的意見，¹⁷ 就當時在臺灣的人類學家伊能與田代而言，先區分「種種人類」就成為最基本之課題。因此伊能與田代在計畫臺灣人類學會的研究項目時，將臺灣的「人類之類別」區分成二大類：「第一大目 臺灣漢人的調查研究」與「第二大目 臺灣漢人以外的調查研究」，作為研究的項目。

¹⁵ 在日本領有臺灣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東京人類學會會長坪井正五郎（1896-1913）曾提出一篇〈蕃情研究の急務〉（蕃情研究的急務）意見書，其中提到：「新領土現為與我等日本人種相異的種種人類所棲息，調查彼等體質風俗習慣等為日本人類學研究者的任務之一。又，新領地於學術上價值頗多，並有太古遺跡遺物，此等之探究亦為我等所當為事業之一。現在之調查、過去之研究，皆應在地形民俗變化不多時著手。」見坪井正五郎〈蕃情研究の急務〉《蕃情研究會誌》4（1900），頁64。臺灣人類學會的成立，一方面開始了以組織化的形式在臺灣從事人類學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成為日本人類學中心——東京人類學會——的殖民地研究據點。

¹⁶ 「人類的理學研究」是伊能嘉矩用以指稱「人類學」的名詞。當時是以「理學」作為 science 的翻譯，使用這樣的名詞，其實已有很強的近代性的學術知識科學性建構意涵在內。而學術與否的分野，也成為接下來伊能在面對臺灣舊文獻時的一個標準。

¹⁷ 參見註15。

同時，為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劃分生物學、心理學、土俗學、言語學、地理歷史學、以及宗教共六個部門，進行個別主題的研究。¹⁸

伊能在臺灣人類學會暫定規則中所提出的問題，其實早在 10 月渡臺前就已經形成了。在伊能計畫前往臺灣進行調查之前，曾於 1895 年 8 月在東京與友人成立的土俗會第三回中發表一渡臺宣言〈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其中伊能提到：

臺灣之住民，今稱有三類、曰漢人、曰熟番、曰生蕃。其中漢人固為後世移植之民，御之不難。獨熟生二蕃，必先完遂其形而上下之研究，次講治道之教。且謂熟、謂生者，乃素因治化之異同而命名之概稱。然徵諸從來探討其地之內外記事，則知試以學術之觀察，至少亦得分派為四、五種族。此不同種族之固有體質、心理、土俗、語言之現狀如何，實當今未知之疑問。今日由我國民之手，當此闡明發展之事，不僅於政治上之希望，乃屬需要。而所謂以自家之手，開拓自家之徑路，於學術上之希望，亦實然也。¹⁹

伊能在來臺之前的宣言中已經明白指出，當時臺灣人種分類乃依據「治化之異同」而命名，並非學術上之觀察。至於臺灣原住民之「不同種族之固有體質、心理、土俗、語言之現狀如何，實當今未知之疑問」。更何況要保護與統治「蕃民」，應先進行其「人類之研究」的根源性調查，因此「熟生二蕃，必先完遂其形而上下之研究，次講治道之教」。伊能在此一渡臺宣言中呈現個人知識發展的視野，一方面，以臺灣「蕃民」為對象的人類學研究計畫，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寓以將來「治道之教」實踐的基礎。在臺灣人類學會成立後不久，伊能嘉矩已被認為是臺灣人類學的代表者。²⁰ 從東京人類學會會員的渡臺到臺灣人類學會的成立，從坪井正五郎的〈蕃情研究の急務〉到伊能嘉矩的渡臺宣言，以及「人類的理學研究」構想，日本近代人類學的視野擴張到新領地臺灣來，殖民地人類學的研究也隨之展開。

¹⁸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 2 回）臺灣人類學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8（1896），頁 149-151。

¹⁹ 伊能嘉矩，〈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引自吳密察，〈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頁 7。

²⁰ 〈人類學會〉，《臺灣新報》79，1896 年 12 月 6 日，第 1 版。

臺灣人類學會成立兩週後，1896年1月1日，臺北附近的抗日者齊集攻擊臺北城，學會馬上向總督府提出申請，將被日軍擊斃與刑死之「匪徒」的屍體骨骸作為該會生物學研究部蒐藏品。²¹ 雖然總督府並沒有接受學會此項申請，但倒是給予學會蒐集資料與調查蕃人上的便利。6月1日，新店馬來社生蕃到臺北，臺灣人類學會即為主要接待與互動的斡旋者，隔日（2日）會員並對這些入城的蕃人進行調查。²² 同時人類學會也蒐集與蕃人相關的文獻資料，向「土人（臺灣人）之有識者」調查清國政府從事生蕃教育事業的情況，以及得到總督府的陸軍中尉長野義虎進行蕃地調查的報告書筆記等資料。²³ 另外，在募集會員方面，臺灣人類學會從創會到1896年6月底已有會員28名。²⁴ 除了學會集體的事務之外，在創會之初主要還是個人的調查活動，這其中特別是創立者田代安定與伊能嘉矩的調查活動最為活躍。不過，兩人從事人類學調查的工作在學會成立前即已開始。因此在人類學會創立後，殖民地人類學的發展，由個人性質的調查，透過專業性團體的交流、討論，有進一步的展開。

由於田代安定與伊能嘉矩兩人都在總督府擔任官職，在當時日本統治初期各地武裝反抗此起彼落的情況下，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實際調查時，擁有許多的便利。伊能嘉矩來臺與人類學會成立之前，田代安定於9、10兩月的宜蘭調查，即是以殖產部派遣之便，從事生、熟蕃的調查。伊能來臺之後，筆記了田代的調查要點，寄回東京人類學會發表。伊能當時擔任總督府的雇員，由於在文書課工作的緣故，沒有離開臺北的機會。²⁵ 同時，在當時臺灣大小反抗

²¹ 田代安定、伊能嘉矩，〈土匪死屍下付願〉，臺灣大學田代文庫，t001，1896。

²² 〈雜報 臺灣人類學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3（1896），頁375-376。

²³ 〈雜報 臺灣人類學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4（1896），頁419。另外，伊能嘉矩在1896年2月，即曾將清代理蕃政策的調查成果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上。見〈臺灣通信（第3回）撫墾局〉，《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9（1896），頁179-184。

²⁴ 從創會到1896年6月10日，共有會員數21名，在6年10日到6月30日之間又有7名會員入會，參見〈雜報 臺灣人類學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3（1896），頁375-376；〈雜報 臺灣人類學會〉，《東京人類學會》124（1896），頁419。

²⁵ 田代安定來臺初期的調查活動，見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1回）會員田代安定君の生蕃實查〉，《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7（1895），頁94-99。另參見陳偉智，〈殖民地統治、人類學與泰雅書寫：1895年田代安定的宜蘭調查〉，《宜蘭文獻雜誌》29（1997年9月），頁3-28；陳偉智，〈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東臺灣研究》3（1998年12月），頁103-146。關於田代安定的傳記，見永山規矩雄編，《田代安定翁》（臺北：故田代安定翁功績表彰紀念碑建設發起人，1930）。

蜂起的氛圍下，伊能其實也沒有辦法不透過官憲同僚的協助，獨自離開臺北前往其他地方進行研究。不過，留在臺北的伊能，倒是開始蒐集相關的研究資料，包括因職務之便，參考由文書課保管之總督府所購入的清代方志等文獻，以及總督府的蕃情調查檔案等。²⁶ 總督府雇員的身分一方面雖限制了伊能活動的範圍，另一方面則使伊能能比較容易的閱讀文獻與接近檔案。比起田代安定，雖然伊能來臺剛開始的時候，沒有辦法進行遠地的田野調查，不過，伊能倒也是在臺北近郊的地方，從 1896 年到 1897 年初這段時間內，陸續地進行平原周邊的熟蕃田野調查。²⁷ 同時也利用在臺北的機會，當大嵙崁或是新店一帶的原住民被招撫而到臺北城時，以總督府的接待委員的身分，進行生蕃調查。²⁸

伊能在這段期間內，主要都留在臺北城內，擔任官職由文書課轉到學務部。直到 1896 年 9 月底，伊能才首度離開臺北，與來臺進行動物調查的東京帝國大學動物學教室助手多田綱輔以及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栗野傳之丞，前往宜蘭進行將近 1 個月的熟蕃調查（9 月 23 日至 10 月 22 日）。²⁹ 隨後更進一步於 1897 年 5 月，受學務部之命，從事「蕃人教育法的調查」。伊能再度與宜蘭調查時的同伴栗野傳之丞同行，從大嵙崁開始南下臺灣西部，至南部後由東部北上，進行前後共 192 天的全島蕃人調查，至 12 月才返回臺北。³⁰ 此行的調查成果，伊能

²⁶ 見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發表於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研討會，1997 年 12 月 18-20 日，一文中的介紹，以及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伊能文庫」中，伊能嘉矩所抄錄的文獻與檔案資料。田代安定亦以擔任殖產局技師職務之便，多次抄錄整理總督府各官署地方機構的例行報告中的相關自然史博物學、蕃族、語言調查等資料。見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田代文庫」中的田野日記與田野筆記。

²⁷ 伊能嘉矩北部「熟蕃」的調查，集中在 1896 年到 1897 年初，成果見伊能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上連續在淡北地區調查的論文。

²⁸ 例如 1896 年 3 月 1 日，新店地方湯社 (tan-shiya) 生蕃 27 名 (男 17、女 10) 隨新店守備隊到臺北城內，伊能嘉矩即作為接待委員，在數日接待之間進行調查，此次調查的成果，見伊能嘉矩，〈新店地方に於ける生蕃の實査〉，《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1 (1896)，頁 272-278。1896 年 6 月 1 日新店地方馬來社「生蕃」到臺北時，也同樣利用接遇的機會進行調查，見〈雜報 臺灣人類學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3 (1896)，頁 375-376。

²⁹ 栗野傳之丞來臺之前是一名植物學家，曾在《植物學雜誌》與《東洋學藝雜誌》上發表多篇植物研究論文。

³⁰ 1896 年 1 月北部「土匪」蜂起，原學務部員多名被殺後，由伊能嘉矩兼勤學務部職務，4 月後專任學務部，擔任總督府國語學校教諭的職務。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116，明治 28 年乙種永久追加第 2 卷 26 號，「藤田捨次郎外八名「栗野傳之丞」「伊能嘉矩」國語學校教諭及書記 任命」，2 門：官規官職：進退。

在回臺北之後，於 1898 年 4 月開始發表相關的論文，並於同年 12 月向總督府提出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情》。³¹

三、種族的知識建構

殖民地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等人所進行的臺灣「人類的理學研究」，從臺灣人類學會的結成，提出人種分類的問題開始，到 1897 年底伊能嘉矩完成全島的原住民調查後，就臺灣人類學會在成立時所提出的臺灣住民中漢人以外的人類種屬的研究，可謂告一段落。1898 年 4 月，伊能開始發表他所建立的臺灣原住民人種分類體系。在 1895 年底伊能來臺至 1898 年建立臺灣原住民的分類體系的這段期間內，伊能是如何在各個議題的論述中，逐步形成他所言的「人類的理學研究」，並建立人類種屬的科學分類呢？

（一）生蕃與熟蕃

1895 年 10 月渡臺的伊能，由於任官職務（總督府文書課）的關係，無法外出遠地進行調查，只好在臺北附近進行零星的田野工作，或是參閱與蒐集清代的文獻紀錄。1896 年初，伊能首先對熟蕃與生蕃的清代指稱原住民的名稱，依據所閱讀的清代文獻進行討論。1896 年 3 月，發表了〈臺灣通信（第 4 回）生蕃と熟蕃〉（臺灣通信〔第 4 回〕生蕃與熟蕃），³² 在文中一開始提出兩個問題：在臺灣成為日本版圖後，日本的新聞雜誌與著書中所言之「生蕃」與「熟蕃」，（1）是何人所命名？以及（2）這樣的名稱又表示何種意義呢？針對（1）的問題，伊能認為，不用說當然是「中國人的命名」。至於（2）的問題，是全篇論文討論的重點。伊能在文中引用《彰化縣志》、《淡水廳志》、《臺灣府志》等清代臺灣方志與郁永河《裨海紀遊》、黃叔瓚〈番俗雜記〉（為《臺海使槎錄》中的一篇）、六十七《臺海采風圖考》等文獻，討論成於中國人之手的清代臺灣蕃人分類法的意義。

³¹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書課，1900）。

³²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 4 回）生蕃と熟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0（1896），頁 224-228。

伊能認為清代臺灣的方志文獻中，依據「歸化之有無」，將蕃人分為「生蕃」與「熟蕃」，是一種「由政治上而來的命名」並非「人種的異同的命名」。³³ 而當時臺灣在「移植漢人以外的人類，即所謂蕃人」，有兩種之區別，即為「生蕃、熟蕃」二種，若是歸化蕃則稱之為「熟蕃」，若為未歸化蕃則稱之為「生蕃」。針對這種分類法，伊能進一步假設，若有屬於同一種族的生蕃與熟蕃，一說固有語言一說臺灣土語（「南方漢語」）³⁴，一住深溪峻嶺一居於平地，一著固有衣服一穿漢衣服，甚至外型上也有不同的地方。雖然這兩種人在學術上來看，並沒有加以區別之必要，但是依據舊的命名法，原屬同一種族的蕃人，即有歸化與未歸化之區別，甚至認為二者間有很大的差別，伊能並引用《淡水廳志》的蕃人風俗變遷之速的紀錄以為證明。³⁵ 伊能接著指出，清代「生蕃」與「熟蕃」的命名，其意義在於，未歸化蕃，即生蕃，是保存「固有狀態」者。歸化蕃，即熟蕃，是「舊態變化快速」者，但是兩者不一定是兩種「異種族」。如果「生蕃」與「熟蕃」只是政治上的分類而已，在學術上來說，有可能是同一個種族，那麼全臺灣蕃人的種類又是如何呢？伊能從方志文獻的分析中，指出「中國人的生蕃觀察」也注意到蕃人並非只有一種而已，有的蕃人是「固棲」的，有的是自海外「移植」而來的。³⁶ 最後，伊能總結四點要旨，作為討論的結論：

- 1、生蕃熟蕃，並非表示其人種之別的命名，而是依據政治上有無歸化之命名。
- 2、故所謂生蕃熟蕃二者，不論其現狀差異如何，不應忘其或屬同一種族。
- 3、不可只以土俗或語言之差異，驟然判定其種族之異同。

³³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4回）生蕃と熟蕃〉，頁225。

³⁴ 即閩南語。

³⁵ 伊能嘉矩所引用的資料為1871年（清同治10年）之《淡水廳志》中卷11「番俗考」附註：「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二十年一大變。乾隆二十九年以前，郡志所錄之類，多耳所未聞，目所未者見。今自大甲至基隆，諸番生齒漸衰，村墟零落。其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之類，半從漢俗。即言音通番語者十不過二三耳」。見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以下簡稱「文叢」〕，1963，1871年原刊），頁306。

³⁶ 這是伊能嘉矩依據黃叔瓚〈番俗雜記〉的記載所得出的結論。同時，伊能在討論清代的蕃人種類認識時，也根據《裨海紀遊》、《臺灣采風圖考》與《臺灣府志》的紀錄，分出「土蕃」與「野蕃」兩種，並認為其中「土蕃」即一般所指之「生蕃」。見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4回）〉，頁224-228。

4、臺灣移殖漢人以外之人類，即所謂蕃人，不限一種，或為土著、或為移殖，此亦古來中國人所信之事。³⁷

在文章最後，伊能又針對 1895 年日本參謀本部所編輯的《臺灣誌》中「生蕃蕃俗」的臺灣生蕃種族別提出批評。《臺灣誌》引用日本福州領事上野專一於《東京地學協會報告》上發表的臺灣調查論文，區分臺灣生蕃為「四種族，一曰バイワン種族、二曰デボン種族、三曰アミヤス種族、四曰平埔（ペポーワン）種族」，並說「平埔蕃即漢人俗稱之熟蕃」。³⁸ 伊能批評其中將平埔蕃（Pe Po Hoan）即熟蕃的並列稱呼，絕非正確之分類。因為所謂熟蕃在伊能看來，是政治上某蕃族歸化後的命名，若バイワン（排灣）、デボン（知本）、アミヤス（阿美）為正確的生蕃分類的話，平埔蕃當然與其中之一為同一種族，而非另外的獨立種族。伊能依據的理由即為上述「2、故所謂生蕃熟蕃二者，不論其現狀有如何之差異，不應忘其或屬同一種族」之論斷。伊能並認為平埔蕃只是熟蕃中某部分的稱呼，而非熟蕃全體之另一代稱，「可以說熟蕃中有平埔蕃，不能說平埔蕃即是熟蕃」。最後伊能並引用《噶瑪蘭廳志》中該地化蕃居處平地，亦稱平埔蕃的紀錄以為佐證。³⁹

從伊能對於「熟蕃」與「生蕃」的討論，我們發現伊能來臺後的前 5 個月內已經涉獵了大量的清代文獻，並從這些文獻中，一方面整理出清代的原住民分類原則，另一方面，則提出自己對生蕃與熟蕃關係的初步解釋。對於清代的命名原則，伊能仍延續在來臺宣言中的看法，認為清代臺灣的生熟蕃分類只是依據政治上歸化與否的原則所形成的分類。透過文獻的分析，伊能提出了臺灣生蕃的種類或有固棲土著與遷徙移殖之分，但是生蕃與熟蕃在學術知識上可能實為同一種族，以往只是因為政治上歸化程度不同而導致現狀的不同而已，並不是相異的兩種種族。

³⁷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 4 回）生蕃と熟蕃〉，頁 227。

³⁸ 這四種分類，是直接引用 George Taylor 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雜誌上的論文中的分類「Paiwans, Amias, Tipuns, Pepohoans」，見 George Taylor, "Formosa: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the Island and its Aboriginal Inhabitants," p. 227。

³⁹ 伊能嘉矩引用《噶瑪蘭廳志》「番俗」中的紀錄為：「蘭番居處……在近港者，原聚平地，以耕種漁獵。故蘭之化番，或謂之平埔番，以其皆處於平地也」，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60 種，1963；1852 年原刊），頁 226；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 4 回）生蕃と熟蕃〉，頁 228。伊能在引文中，將《噶瑪蘭廳志》中的「番」翻譯成「蕃」。

（二）平埔蕃的課題

1896年，伊能除了閱讀總督府所藏的文獻檔案之外，同時也開始進行臺北周邊的「平埔蕃」的田野調查。1896年7月，發表〈臺灣通信（第8回）北東部地方に於ける平埔蕃〉（臺灣通信〔第8回〕北東部地方の平埔蕃），除了繼續爬梳文獻資料之外，並加上在北部調查的田野資料，包括伊能自己與田代的調查成果。⁴⁰ 在文中，伊能進一步發展在3月時提及的「熟蕃」與「平埔蕃」的看法，他先引用鄧傳安《蠡測彙鈔》之〈臺灣番社紀略〉中「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的紀錄，討論「熟蕃」的差別，認為如果熟蕃是生蕃歸化後的名稱，則如同生蕃有許多種類一樣，熟蕃也有許多的種類，若要判定某熟蕃是由某生蕃所歸化，並不容易。雖然鄧傳安紀錄中說明熟蕃在分布區域上有平地與近山之別，但是伊能認為不能藉此判定「近山熟蕃」就是該地生蕃所歸化者。依據他自己與田代調查的北部熟蕃（臺北與宜蘭），以及兩人調查的北部生蕃（從大嵙崁到宜蘭）的資料所見，北部生蕃雖然彼此在語言上有所差異，然而這些差異只是方言上的轉訛而已，仍屬於同一種語言。若進一步與北部熟蕃比較，在語言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伊能認為其彼此應屬不同的「Branch（分支）」無疑。北部熟蕃在伊能的分析下，應屬與當時北部生蕃不同的某種前生蕃歸化後的人種。

伊能接著解釋熟蕃中稱為平埔蕃一群的由來，他先引用《噶瑪蘭廳志》與《裨海紀遊》的記載，說明雖然都居處於平地，但對二者生活樣式內容的描述卻是完全不同。而當時伊能所見之北部平埔蕃的「現狀」，其生活則是如同「移殖漢人」一樣的樣式。於是伊能推論「平埔蕃」原為「平地的蕃人」的意思，而不是當時某些主張的「熟蕃一體之稱呼」（指參謀本部編的《臺灣志》一書等，及當時一般的說法）。並從平埔蕃所指對象狀貌不一的情況來看，平埔蕃反而只是「熟蕃」的一個「Group（群）」而已。⁴¹ 北部的熟蕃其實即為此種分布在生蕃與漢人中間的平埔蕃。

伊能在文中接著比較臺北與宜蘭平埔蕃的風俗與語言，認為臺北的平埔蕃歸化才不過百年，在《臺灣府志》所記載的固有蕃俗，「宛如現今生蕃」，但是如今

⁴⁰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8回）北東部地方に於ける平埔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4（1896），頁384-389。

⁴¹ 伊能嘉矩的原文為「Grop」，應為「Group」漏字。

卻已與支那人相同。而宜蘭的平埔蕃，根據田代安定的調查與帶回台北的蒐集品顯示，仍保有舊有的衣服、器物等。伊能也比較了臺北與宜蘭方面的語言，發現兩地的語言雖有差異，但是在關鍵之處則完全一致。⁴² 接下來伊能提出：「此等人類到底是何種種族呢？以及與其附近的北部生蕃關係如何呢？」等問題。並認為今後要研究其與此平埔蕃屬於同群的「未歸化蕃」（即生蕃）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其他屬於不同群的生蕃進行比較，才能對這些問題加以斷定。⁴³

在這篇文章的後半部中，伊能根據他在北投社與毛少翁社的調查所記錄的口述歷史，進一步分析。伊能從北投社 Poanyupie（潘有秘）採集到：

我祖先兩百年前從唐山山西移殖來臺，當時人少蕃多，於是倣之蕃化，今北投附近同群（即平埔蕃）有二千餘人（其中北投社二百人）。其後今之臺人由內地移殖而來，我社亦於三十年許以前歸化清朝。⁴⁴

也在毛少翁社翁文卿（Auvunken）處採集到：

臺灣北部地方原為東洋（即日本人）所占据。其後今之臺灣人由中國本土移殖過來。東洋人退居山中與蕃雜居，與之模化，我社即其子孫。⁴⁵

伊能根據這兩則口述歷史，分析（1）原先臺灣人少蕃多，移殖者模仿蕃人而變成蕃人。口述歷史中的「蕃」，即是與「平埔蕃」同群的「蕃人」。也就是說，「平埔蕃」為被模仿的「固棲人類」。（2）歷史上元、明人與日本人與臺灣的關係密切，其人民有部分留下亦為事實。這些移殖者為求生存，於是模仿「固棲人類」（即蕃人）的語言風俗，無疑乃是生存上必然之事。（3）從以上兩點可以想像必然會產生「彼此的雜種」的事實。最後伊能依據這些分析得出結論（4），所謂平埔蕃可分三類：第一類「本然的蕃族」、第二類「模化的蕃族」與第三類「雜種的蕃族」。並以這個結論來解釋為什麼同是「平埔蕃」的文獻紀錄，在內容上

⁴² 伊能嘉矩所比較的語言是他自己所調查的臺北附近的北投社與田代安定調查的宜蘭平埔蕃，比較的語料主要是1到10的數字與牛犬豬等家畜動物的基本語料。

⁴³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8回）北東部地方に於ける平埔蕃〉，頁384-389。

⁴⁴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8回）北東部地方に於ける平埔蕃〉，頁386-397。

⁴⁵ 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8回）北東部地方に於ける平埔蕃〉，頁386-397。

卻存在判然明顯差別的原因。例如伊能認為《裨海紀遊》中形容平埔蕃體質特徵之「兩目拗深、瞪視稍別之」的紀錄是描述「本然的蕃族」的。伊能認為在宜蘭方面的平埔蕃還可以見到這樣的特徵，但是臺北的平埔蕃則絲毫不見「如斯之徵候」，因此伊能判斷宜蘭的平埔蕃應屬於「本然的蕃族」。論文最後伊能也提到了在「種族研究上」所必要之參考因素的「自稱」，並指出這些北部地方的「蕃人」採用了漢人命名的「平埔蕃」作為自稱。

伊能在文章中分析了兩個問題：一是在他看來，平埔蕃是居住平地的蕃人，只是臺灣熟蕃中的一種而已，並非熟蕃的總稱或另稱。同時某地的熟蕃是否為當地生蕃所歸化，則是一個未決的疑問。以北部而言，熟蕃即為平埔蕃，但並非由該地生蕃所歸化變成的，而是屬於另一種「固棲蕃人」。另外，根據口述資料分析，伊能依據模仿與混血的原則，區分三種類型的平埔蕃。就北部的平埔蕃而言，伊能認為宜蘭的平埔蕃是「本然的蕃族」，而臺北的平埔蕃或是「模化的蕃族」如北投社，或是「雜種的蕃族」如毛少翁社。在伊能的分析中，隱約暗示著宜蘭平埔蕃是較為原始的蕃族，但卻又與該地生蕃不同。同時北部平埔蕃在語言上與「本然的蕃族」宜蘭平埔蕃的一致，則是北部平埔蕃與該地「本然蕃族」模仿或混血後的結果所致。

從 1896 年這兩篇具有理論意義論文的分析，我們發現伊能在來臺不久後，已經透過文獻的閱讀與臺北周邊熟蕃、生蕃初步的實際田野調查，建立了解釋臺灣原住民的理論，並提出初步的種族分類。伊能當時建立的理論是：原先臺灣有許多「蕃」，有固棲、有移殖等先來後到，不一定是同一種族。但是在清朝治下，由於政治上的歸化，分成「生蕃」與「熟蕃」，這也是當時漢人所用的分類。若就學術上的分類來看，不應將生蕃與熟蕃視為不同的人種類別，反而有可能是屬於同一人種。當時所謂的「生蕃」在伊能的理論中，固為「固棲人類」的活標本不用說，而「熟蕃」原本也是生蕃，都是臺灣原本的「固棲人類」。臺北與宜蘭的歸化蕃（在清代的定義下是「熟蕃」）稱為平埔蕃，並非熟蕃的代名詞或另一總稱，而只是熟蕃中居於平地的一種「蕃人」。不過，平埔蕃中也因為與歷史上其他地方所遷移來臺的移殖民混血或是模仿，又呈現了純粹與不純粹的「平埔蕃」類型之別。

當時只有田代安定曾於 1895 年 9、10 兩月調查過宜蘭，既然伊能已有了上述的看法，那麼前往一探「本然的蕃族」的實存狀況，就成為伊能必然的田野方向了。於是在 1896 年 9 月 23 日，伊能啟程出發前往宜蘭進行一個月之久的調查。前往宜蘭的原因，除了自己發展出來的問題之外，另外田代於 1895 年 10 月進行的宜蘭調查，也給伊能許多啟發。宜蘭之行，對伊能來說，一方面是終於有了離開臺北遠行調查的機會，可以獲得更多的實際田野資料，以利「人類的理學研究」的進展。另一方面，也是要解決自己在建立解釋中所提出的問題。伊能在 7 月時提出了，宜蘭方面的平埔蕃應是北部平埔蕃中的「本然的蕃族」的假設，同時，也提出某生蕃與某熟蕃可能為同一種族的假設，但是他比較田代提供的民族誌資料，卻發現與北部生蕃（大崙崁到宜蘭）的語言並不相同，那麼宜蘭的平埔蕃「本然的蕃族」是另一種「蕃人」嗎？1896 年 9 月，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学動物學教室的助手多田綱輔，⁴⁶ 欲進行宜蘭的動物學調查時，當時擔任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的博物學家栗野傳之丞與之同行，兼任國語學校教諭的伊能嘉矩亦同時前往。調查期間沿途經過了基隆社寮島，雙溪三貂社，以及宜蘭平原方面共 7 社平埔蕃社，並在宜蘭城內停留 6 日，查閱官署（主要是撫墾署）的檔案以及密集訪問住在城內的「噶瑪蘭三十六社總頭目」振金聲。⁴⁷ 調查完宜蘭回臺北之後，在 1896 年 11 月到 1897 年 4 月這段期間內，伊能繼續調查臺北附近的平埔蕃社。⁴⁸

（三）全島蕃人調查的登場

伊能嘉矩在 1896 年到 1897 年間，除了分析清代文獻中的人種分類，並參照北部平埔蕃的調查，提出新的族群分類的解釋之外，並沒有遺忘「人類的理學研

⁴⁶ 伊能嘉矩在有關此次宜蘭調查系列論文的第一篇概述調查經過的文章，記錄為「多田綱介」，在此次調查的田野日記〈貂山冷水〉中也是記錄與「多田綱介」同行，但是在多田發表此次調查的論文時，名字則是「多田綱輔」，本文依據多田自己發表文章時所用的名字，修正伊能的紀錄。伊能關於此次調查的紀錄，見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 18 回）宜蘭方面に於ける平埔蕃の實査〉，《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36（1897），頁 373-378；伊能嘉矩，〈貂山冷水〉，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文庫」M035，1896 年。另外多田宜蘭調查論文，見多田綱輔，〈臺灣動物調查〉，《東洋學藝雜誌》199（1898），頁 168-176、201（1898），頁 290-295、206（1898），頁 506-510。

⁴⁷ 此行調查的田野日記，見伊能嘉矩，〈貂山冷水〉，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文庫」M035，1896 年；田野中與振金聲筆談的筆記，見伊能嘉矩，〈クバララワン志料〉，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文庫」M036，1896 年；調查時所畫的簡圖，見〈熟蕃資料〉，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文庫」M040，1896 年。

⁴⁸ 在調查宜蘭之前伊能嘉矩只調查過臺北附近的北投社與毛少翁社而已。

究」計畫中的「生蕃」課題。在解釋清代文獻時，提出了若不陷於清代政治上的歸化、未歸化的熟蕃、生蕃分類的話，熟蕃原先也是「固棲人類」的一種，同時在臺灣原來也有不同的蕃人的情況下，當時的某熟蕃與某生蕃二者，在學術上可能為同一種族的看法。伊能並且用當時在臺北附近觀察到的生蕃（主要是大嵙崁與新店一帶的蕃人）與文獻上所記載的蕃人的模樣互相印證，說明原先未歸化前蕃人的生活樣式。伊能在臺北周邊所調查的生蕃民族誌資料，就成為伊能「人類的理學研究」上說明未歸化蕃人、或固棲蕃人的活標本。在 1896 年的一整年間，伊能除了分析文獻上的生蕃之外，也調查了新店與大嵙崁一帶的生蕃，並發表數篇文章。這些對文獻與北部生蕃的分析，除了當作討論平埔蕃課題的比較項之外，並初步形成了對生蕃的解釋。⁴⁹

1897 年 4 月 23 日到 30 日的一週間，總督府在撫墾署設立一週年之際，於臺北召開撫墾署長諮問會議，除了檢討一年來的理蕃行政之外，同時總督府各部門也提出諮詢案，由各撫墾署長依據各地的蕃情狀況加以回答與討論。⁵⁰ 在諮問會的討論中，各撫墾署長最關心的是蕃人撫育的問題。因此，會中委由學務課長伊澤修二研議蕃人教育法的相關計畫。⁵¹ 事後伊澤指派栗野傳之丞與伊能嘉矩，進行全島的生蕃調查，以研議有關蕃人的教育法。⁵²

栗野傳之丞與伊能嘉矩兩人，在總督府蕃情調查以及研議蕃人教育法的脈絡下再度合作，於 1897 年 5 月 23 日離開臺北前往大嵙崁，展開全島的蕃人調查之旅。兩人從西部南下再轉由東部北上，最後於完成東部的調查後，12 月由花蓮港搭船北上回臺北。伊能此回歷時 192 日的全島調查，如果注意他的行經路線與在各地方調查的時間，我們會發現他將調查的重點集中在臺灣西部蕃人分布的各相關地區，東部的調查事實上只有從 11 月 6 日到 12 月 24 日，共 49 日而已。他們

⁴⁹ 伊能嘉矩在 1896 年，對臺北周邊原住民的討論，見伊能嘉矩，〈大嵙崁 (Toa ko kam) の蕃婦〉，《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0 (1896)，頁 228-230；伊能嘉矩，〈新店地方に於ける生蕃の實査〉，頁 272-278。

⁵⁰ 總督府各部門提出的諮問案，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 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18)，頁 35-40。另外此次會議的實錄，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180，明治 30 年乙種永久保存，第 36 卷第 2 號「撫墾署長諮問會議議事要錄」，12 門：殖產：撫墾。

⁵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 第一卷》，頁 267。

⁵² 學務課長伊澤修二之所以會指派栗野傳之丞與伊能嘉矩的原因，筆者推測，一方面是 1896 年底兩人調查宜蘭的資歷，另一方面，應該是伊能當時在臺北因臺灣人類學會的活動已經累積了人類學研究的聲譽，而栗野在來臺之前已是知名博物學家。栗野時任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伊能則是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教諭。

並沒有在臺灣東部的調查上，用上與西部調查同等時間與精力，主要的原因應該是，1896年時田代安定已對臺灣東部進行過一次將近5個月（8月到12月）的調查（即田代安定的臺灣東部「殖民地」調查）。⁵³ 同時由帝國大學所派遣的鳥居龍藏從1896年8至12月的第一次臺灣調查，調查區域也是在臺灣東部。而鳥居的調查成果，在1897年8月時已發表〈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東臺灣各蕃族及其分布）。⁵⁴ 伊能在此次調查所完成的全島蕃人分類的論文中，也提及東部有關「排灣、阿美的情況」是參考鳥居龍藏的研究成果。⁵⁵

伊能嘉矩在1897年底完成臺灣蕃人的全島調查後，1898年4月23日，在由臺灣總督府各部門與理蕃行政事務相關官員為主體所組成的蕃情研究會成立首日，於臺北城內淡水館舉行的發會式上，以〈臺灣土蕃進化的程度〉（臺灣土蕃進化的程度）為題目，第一次發表調查成果。⁵⁶ 在這次的演講中，伊能第一次提出了所謂「漢人族之外」的臺灣蕃人全部的系統分類。伊能在這次的演講中，先針對臺灣蕃族的「分類系屬」提出分類表。同時說明分類的原則是依據「第一、體質的特徵，第二、土俗的異同，第三、思想的現狀，第四、語言的異同，第五、歷史的口碑」，將「共有某種特殊性質的（蕃人）集成一體，再依據其共有特徵的遠近，劃定系統上血緣的遠近」。⁵⁷ 不過，此文的重點在於通論性地分析臺灣蕃人整體文化進化的程度，伊能在文中並沒有說明各蕃族的分布區域與文化特質。⁵⁸ 1898年5月，伊能在蕃情研究會的演講後，進一步發表〈臺灣通信（第

⁵³ 參見陳偉智，〈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一文中的分析。「殖民地」是當時的用語，為移民地之意。

⁵⁴ 鳥居龍藏，〈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36（1897），頁378-410。

⁵⁵ 見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22回）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6（1898），頁301-307。

⁵⁶ 〈本會發會式〉，《蕃情研究會誌》1（1898），頁90。該次的報告除了登載在兩日後的《臺灣新報》外，並發表於1898年8月創刊的蕃情研究會機關誌《蕃情研究會誌》上。伊能嘉矩於1898年4月23日的演講紀錄，見〈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蕃情研究會に於ける伊能の說）〉，《臺灣新報》486，1898年4月26日，第2版、《臺灣新報》489，1898年4月29日，第2版。另見，〈臺灣に於ける土蕃の分類及び其の現在通有する開化發生の度〉，《蕃情研究會誌》1（1898），頁2-15。

⁵⁷ 伊能嘉矩，〈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臺灣新報》486，1898年4月26日，第2版。

⁵⁸ 此文後來譯成德文：Kakyo Ino (伊能嘉矩), "Die Wilden Staamme von Formosa, ihre Einteilung und ihr Kulturzustand,"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von Erdkunde in Berlin* 34(1899): 63-74。我推測翻譯這篇文章的人應該是當時同是蕃情研究會會員的德國人Mueller氏。隨後於1900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刊物也對此文加以介紹，被視為截至當時為止，關於臺灣的種族狀況的最新研究成果。

22 回)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臺灣通信〔第 22 回〕臺灣各蕃族の分布)。文中除了臺灣各蕃族的分類系屬表之外，並進一步說明各蕃族的分布區域與文化特質。⁵⁹ 伊能在文章中以「群／族／部」的樹狀階層系屬表，將臺灣蕃人區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說明各群的分布地以及體質特徵、文化社會特徵與語言特徵。伊能在此一分類系統中，將 1896 年提出的平埔蕃課題整合，歸類為全島蕃人分類系屬第四群「Tanah 群」。從伊能所完成的體系來看，伊能在 1896、1897 年稱之為「平埔蕃」的蕃人，到了 1898 年時已改稱為「Peipo (平埔) 族」。同時在「居住在平地」的共同特徵下，將其與東部的「Amis (阿美) 族」劃分為同一群 (Tanah 群)，以求分類系統上的一致性。

表一、伊能嘉矩的臺灣蕃族分類 (1898 年)

	群	族	部
臺灣土蕃	第一群 Ataiyal	族 Ataiyal	第一部 Ta ⁿ gare-Ataiyal
			第二部 Daiya-Ataiyal
	第二群 Nakuijyo	第一族 Vonum	第一部 Matsoan-Vonum
			第二部 Rakvisyan-Vonum
			第三部 Sevukun
		第二族 Tso'o	第一部 Tso'o-no-Omiya
			第二部 Tso'o-no-Oiyi
	第三群 Kadas	第一族 Tsarisen	第一部 Parizarizao
		第二族 Payowan	第二部 Tepomomak
			第三部 Pakurukal
	第四群 Tanah	第一族 Amis	第一部 Kawan-an-Amis
			第二部 Kawere-Amis
		第二族 Peipo	第一部 Tta'o
			第二部 Siraiya
			第三部 Lloa
第四部 Pazzohe			
第五部 Hinapavosa			
第六部 Taokas			
第七部 Kuvarawan			
第八部 Amutoura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臺灣通信 (第 22 回) 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頁 301-307。

⁵⁹ 見伊能嘉矩，〈臺灣通信 (第 22 回) 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頁 301-307。

從 1895 年底來臺至 1897 年 4 月在臺北所發展出來的解釋體系，到 1897 年有了進一步的全島性的蕃人民族誌資料的檢證。1898 年全島蕃人的調查結束之後，伊能完成了全島蕃人各族的分類並建立了初步的解釋理論。除了在蕃情研究會發表外，同時也將研究成果持續地寄回東京，在東京人類學會的刊物上發表。1899 年初，伊能向總督府提出完整的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情》。伊能此一完整的臺灣全部蕃人的民族誌報告，在 1900 年 3 月由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正式出版。⁶⁰

1900 年出版的《臺灣蕃人事情》中，伊能除了延續「平埔族」的修正之外，其他的蕃人分類並沒有進行修正。在此一完整的民族誌中，伊能將之分成五個部分：「第一篇：蕃俗誌」、「第二篇：蕃語誌」、「第三篇：地方誌」與「第四篇 沿革誌」，以及最後的結論。「地方誌」與「沿革誌」主要是利用清代方志文獻資料所建立的地方史，與理蕃及蕃人教育的沿革。「蕃俗誌」、「蕃語誌」則是依據彙整 3 年間的文獻整理與田野調查的資料所構成的，其中，「蕃語誌」分析平埔族之外的 7 個蕃族的數字基本語料（1 到 10），並與馬來語（マレー語）的數詞進行相似性的比較，推論臺灣蕃人都是同一種，即馬來語系的人種。伊能在 1896 年曾依據文獻推論臺灣的蕃人可能有不同的種類，到最後根據語言比較，已經完全推翻之前多元論的看法，確立馬來語系的人種一元論主張。在 1898 年首度提出蕃人分類系屬表中以「群／族／部」的原則分類，將所有的「群」都歸類在「臺灣蕃人」之下，而臺灣蕃人即屬於馬來人種，伊能透過語言比較，將此一推論加以確立。本書中「蕃俗誌」的部分，則是全書的重點，分為「各說」與「總說」。在「各說」中分析八族各族的分布地域、現狀、社會組織與物質文化。在「總說」中則是綜合各族的文化要素，依據「進步程度」（進化的原則）分析在某文化要素中各蕃族的進化程度。伊能所謂的蕃人的進步程度，在他來看是與地理因素高度相關的，他在解釋蕃族的分布狀況時，提出了「地理與蕃人進步程度的關係」的結論。⁶¹ 以此來說明何以在他的分析中，分布在臺灣北部山區的「Ataiyal（泰雅）」族是進化程度最低的，而越往南，地勢越低，越容易與外界交通的諸族，則進化的程度越高，甚至有些族的文化要素發展，與漢人不分軒輊。居處平地的平埔族則是所有蕃人中進化程度最高的，幾乎到達與漢人一致的地步。在 1898

⁶⁰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

⁶¹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頁 112。

年提出的全島蕃人分類中，所記錄的各族的體質、土俗、語言等文化要素，在 1900 年的書中成為伊能說明臺灣各族進化程度的證明，例如宗教上，從泛靈信仰到崇拜特定的象徵物的發展。在社會組織上，從簡單到複雜的單系繼嗣制度的不同等，都在伊能進化主義的文化觀中，編入階序性的進步程度階梯位置中。文化特質的差異，變成了進化發展的順序，空間上的不同，變成了時間上的先後。

四、種族知識的科學性宣稱

伊能於蕃情研究會的報告，可以看成是一種解釋臺灣原住民複雜的人文活動的全新的種族知識。其中除了如同先前相關論文一般對清代文獻紀錄批評為非科學的知識外，伊能在來臺宣言中提及的「外人記事」，在報告中亦加以指名批評。伊能針對 George L. Mackay 與 George Taylor，批評他們的臺灣種族知識的科學性問題。伊能曾經說「以自家之手，開拓自家之徑路」（渡臺宣言），於此也成為知識的科學競爭問題。當然在這樣的論爭中，伊能事實上是近代西方的種族知識作為普遍的標準。如果種族知識的科學性宣稱是伊能建構知識的一個原則的話，那麼為伊能所批評的外人記事，是如何來再現臺灣的種族現象呢？

在這裡本文以被伊能指名的 George L. Mackay 的論述，作為討論種族知識科學性宣稱競爭的代表文本。⁶² 有趣的是，Mackay 也曾經談過關於臺灣的自然史知識的科學性問題。Mackay 在 *From Far Formosa*（《臺灣六記》）中曾經批評當時關於臺灣自然史知識的狀況：「臺灣的自然史還是一本未寫之書。就是第一流學者的記述，也是淺薄而不可靠的。所謂中國科學的任何研究，都是經驗式的，必須謹慎地加以甄別；而外國科學家在臺灣所做親歷調查也很少。」⁶³

⁶² 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全面地討論十九世紀西方人關於臺灣自然史的研究，一個背景性的有關英國自然史學者，包括專業及業餘的，對於中國研究之分析，參見 Fa-ti Fan (范發迪),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⁶³ 見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15. 中文翻譯參照周學普譯本加以修改，周學普的翻譯，見 George L. Mackay 著、周學普譯，《臺灣六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69 種，1960；1895 年原刊），頁 38。雖然 Mackay 是在〈地質〉這一章的開頭作如是評論，但是對他而言「民族學」亦是包括在自然史的範圍內，在 *From Far Formosa*（《臺灣六記》）內容所區分的六個部分，第二的部分「The Island」即包含了從地質、動物、植物到人種的章節。附帶一提，MacKay 此書，亦有譯為《臺灣遠記》。

至於Mackay的「種族」知識是如何呢？Mackay將臺灣居民分為馬來人（Malayan）與漢人（Chinese）兩類。在 *From Far Formosa* 第九章“Ethnology in Outline”中提到：「臺灣北部的居民可分為兩大類：原住民（the aborigines），無論是野蠻的或是開化的，都是馬來人；而漢人則是屬於蒙古人（Mongolian）」，⁶⁴ 接著對這兩種「人種」（race）進行描述與分類。對於「漢人」，Mackay認為：「在數目、智力與勢力上均占第一位的主要人種是漢人。人種學家（ethnologist）對於他們不覺得有什麼困難的問題，因為他們的起源與人種關係都是容易追溯的。」至於臺灣島上除了漢人之外的另一人種原住民呢？這是Mackay在這一章中主要的分析對象。Mackay摘要地描述了原住民的遷徙傳說、風俗習慣及體質特徵。在體質特徵中，Mackay比較頭顱形狀、頭髮形狀和顏色、眼睛顏色與鼻子的形狀，指出了原住民的體質特徵「表示與馬來型的島民的親族關係」，對於頭骨的體質特徵（「頭蓋骨狀如圓球」），Mackay並說：「這是屬於低級種族的島民的特徵」。⁶⁵ Mackay並製作了一個圖表表示臺灣的「人種學」（the ethnology of the people）。關於原住民的人種分類問題，Mackay認為：

漢人稱全島的原住民為番人（barbarians），依後者所住之處是平野或高山、反抗或順從中國風俗的程度而予以分類。在東海岸的大平原中有些番人承認漢人的優勢，服從漢人的信仰方式，漢人稱他們為平埔番（Pe-po-hoan）。在一個更南的海邊平原中有另一個原住民的部落，漢人稱他們為南勢番（Lam-si-hoan）。不服從漢人的高山人，則被稱之為生番（Chhi-hoan）。有些番人在西部與漢人雜居，被稱為熟番（Sek-hoan）。這些名稱都是漢人所用的，表示著原住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現在日本人占領著臺灣，將有新因素輸入。日本人對於現在的居民的關係還不清楚，但對於番人似乎將用懷柔政策。⁶⁶

Mackay的 *From Far Formosa* 於1895年日本領台後不久出版，在上述的人

⁶⁴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92; George L. Mackay 著、周學普譯，《臺灣六記》，頁40。

⁶⁵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97; George L. Mackay 著、周學普譯，《臺灣六記》，頁42。

⁶⁶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p. 93-94; George L. Mackay 著、周學普譯，《臺灣六記》，頁40。

種關係討論中還提到了「現在日本人占領著臺灣，將有新因素輸入。」⁶⁷ 這個 Mackay 在當時還不清楚的日本與臺灣居民關係將如何形塑的「新因素」(new element)，除了將使臺灣的社會形構全面地改變外，也包括了新的知識裝置的登場，例如伊能嘉矩在 1895 年後的三年內，即快速地展開對包括 Mackay 的種族自然史知識在內的批判與重寫。Mackay 書中的平埔番、南勢番、生番與熟番，即是日後被伊能嘉矩批評為不正確的「外人記事」之一。

然而從知識系譜來看，伊能嘉矩顯然沒有離開 Mackay 等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自然史對於臺灣的種族記述太遠。在知識論上，他們還是分享著共有的人類種族自然史呈現的地理分布現象的演化階段的普世性預設。同時也使用相當一致的調查與論證方法：基本文化特質、體質特徵、語料的蒐集以及建立在比較民族學基礎上，描述性的，以分類為任務的種族知識。一個林納式 (Linnaeusian) 的自然史分類傳統，在 Mackay 是以蘊含福音啟示與傳播可能性的「人種學」的種族知識；在伊能嘉矩則是放在「亞細亞各種人類之系統關係」的臺灣「人類的理學研究」的種族知識。伊能所知與所做的「人類學」本質上與他所批評的 Mackay 等西方人的記述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在知識上不是質的不同，而是量的差異。伊能收集的比較民族學的田野資料比其他先前的西方旅行家、傳教士、官員、學者等專業或業餘的自然史博物學者先行者們更豐富，並在這個對於臺灣人類的自然史的種族知識研究中，提出了他所認為的更為窮盡、範圍更全面的「種族」分類。

有趣的是，伊能嘉矩的科學的、學術的研究，接下來也遭受到森丑之助以非學術的、不是全面性的研究的類似理由的批評。森丑之助 1913 年在〈生蕃對臺灣島的影響及臺灣蕃族學術調查〉一文中，如此地描述與評價伊能的研究：

過去發表過很多有關臺灣蕃人的紀錄者是伊能嘉矩。他的《臺灣蕃人事情》是在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出版的，書中他首次縱論臺灣蕃族及地理。這是他於前一年奉臺灣總督府命令，偕同栗野傳之丞到當時一般人能夠到達的平地附近蕃地巡察，他們環島一周後，將實地巡察所獲的資料，加上伊能到訪各地方撫墾署所獲的資料，以及撫墾署官

⁶⁷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93. 原文是“Now that Japan has possession of the island a new element will be introduced”。

員所調查、編輯的書類為基礎，作出綜合性的編纂而成的。

比伊能嘉矩更早進入蕃地探險的我們，⁶⁸ 對於伊能氏的這一本報告，無法認定是一部調查研究報告，只能說，這不過是他編纂的作品。

我甚至不得不懷疑伊能氏為什麼忽略了理應實地調查的事項，只是利用極「薄弱的」記錄文書及通事所提供的不正確消息，而且只到山麓地帶一般官員常去訪問的蕃社訪問，沒有深入蕃地搜求有根據的田野資料，就開始撰述他的報告。

因此，伊能氏記載的臺灣蕃族之分類和記述內容，我已發現不少錯誤之點，就因為沒有其他專書統括地記述臺灣蕃族各項要目，所以他的書過去被臺灣總督府當作範本使用。我們是不受公務機關派遣的人，只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到蕃地調查，不像伊能氏等官員，可以拿總督府差假令，或在各地官署支援下進行實地調查。伊能氏迄今是拿薪資的臺灣總督府囑託，享有各種方便與研究時間。他為什麼沒有作更深入的調查研究？這是我無法理解的事。⁶⁹

森丑之助對伊能嘉矩的批評恰恰正是在田野工作的問題上。但是對他而言，伊能研究上的「學術性」問題，並不在伊能的自然史種族演化的文化理論上，而是在他的方法上。⁷⁰ 森認為伊能的問題在於只依靠一些可信度值得懷疑的文獻、來源有問題的撫墾署蕃人訪問的資料，就據以建立他的種族知識。弔詭的是，對於田野工作實際調查的資料蒐集的要求，恰恰是伊能自己在進行調查時充分自覺的方法。⁷¹ 相對而言，森似乎並不特別關心「理論」的問題，或者民族誌資料的知識論問題，然而他的作品似乎也顯示了與伊能等人共有類似的文化演化觀。⁷²

⁶⁸ 森丑之助文中的「我們」，是指他自己與曾經一同進行調查的烏居龍藏。

⁶⁹ 森丑之助，〈生蕃對臺灣島的影響及臺灣蕃族學術調查〉，收於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527-529。

⁷⁰ 森丑之助似乎頗為在乎伊能嘉矩的「官職」身分，除了批評伊能並沒有善加運用官職帶來調查的便利外，也對比地數次強調自己進入蕃界調查時並不總是具有官職身分及其在資料蒐集上的便利。

⁷¹ 1897年全島調查的旅途中，伊能嘉矩在田野筆記〈探險隨感〉中寫下了有名的「從事探險應記得的五條要箴」與「探究事務的旅行應遵守的三條要件」。其中強調了調查者在旅程中的精神與健康，語言與相關知識的準備，以及在實際田野中的「注意周到」的細查眼光，還有當場筆記的重要性。關於伊能的田野工作的進一步討論，見陳偉智，〈知識與權力：伊能嘉矩與臺灣原住民研究〉，《當代》135（1998年11月），頁28-51。

⁷² 森丑之助的臺灣原住民民族誌作品，雖然已經漸漸發展出從所研究的原住民社群內部的功能與歷史

森對田野工作的強調，以及對於臺灣各地原住民文化細節的熟悉程度，本有可能使他發展出與文化演化論不一樣的社會文化理論，如同 Trobriand Islands 之於 Malinowski 的功能論與北美印地安人之於 Boas 的歷史文化論一般建立在對於十九世紀以來演化論人類學知識的批判與突破。森的臺灣蕃人的人類學研究似乎是還是依循著文化演化觀的知識論預設，特別是伊能的知識建構中被分類出來的，彼此互相獨立、各自內部具有文化象徵與社會組織原則一致性的種族單位。從這一點來看，森似乎仍然沒有離開伊能太遠。或者更廣泛地來看，如果說十九世紀的種族知識是建立在人類的自然史文化演化論的知識論基礎上，森似乎沒有離開十九世紀、沒有離開演化文化論太遠。

五、結論：「種族」在臺灣的歷史性

在 1872 年 4 月中，我在淡水買了一所房屋，就自問到：「我是為什麼到這裡來的呢？是為了要研究臺灣的地質、動物和植物嗎？為了要研究臺灣的人種問題嗎？為了要研究臺灣人民的風俗習慣嗎？」不，這些都不是我主要的目的。我並非因此而離家遠行，加拿大的教會並非因此而授我聖職，派我出國的。我的任務十分清楚，就是奉主的命令：「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我無論作什麼其他事情，這種任務必須完成；無論作什麼事情，都必須與這任務之完成有切實的關係。宣教師固然也可以研究歷史，地質學，人類學，社會學或其他任何的學科，但必須就他們與福音的關係上研究之。宣教師主要的任務，是向異教徒宣傳福音，使其改邪歸正，並培養其對上帝的信仰，這也就是我離開家鄉而來的臺灣的主要目的，我無時或忘，決不為其他事情所妨礙。」⁷³

George L. Mackay, 1895

的解釋該社群的文化特質與社會組織原則，但是並沒有進一步地挑戰文化演化的理論成說。關於森丑之助的研究，參見楊南郡著，笠原政治、宮岡真央子、宮崎聖子編譯，《幻の人類學者森丑之助：台灣原住民の研究に捧げた生涯》（東京：風響社，2005）。

⁷³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135; George L. Mackay 著、周學普譯，《臺灣六記》，頁 56。

余嘗有志於修人類學，數年以來致力於斯學之研磨，久期於闡明亞細亞各種人類之系統關係，聊資裨補學界於萬一。而今，斯學之溥博淵泉的臺灣，屬我版圖，不僅學術上，將來治教之需要上，亦逢不可不速為研究調查之機。吾人志於斯學，豈能不奮起於此時哉？⁷⁴

伊能嘉矩，1895

Mackay 的人種分類，可說是他在臺灣三十年的傳教經驗中對於在地知識的遭遇與西方的人種自然史知識的結合。他對於自然史的知識具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與掌握，一方面批評前人，西方人與中國的科學性紀錄不夠科學，同時在自傳性質的 *From Far Formosa* 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描述臺灣的自然史：地質、動物、植物與人種。對他而言，自然史的知識，很清楚的是作為傳教的輔助。對於 Mackay 而言，自然史只是作為瞭解上帝的世界與福音（God's World and Word）的工具。而在伊能則是講求「治道」之前需先講求「學術」的瞭解。

如果伊能的人種分類的種族知識是建立在新知識典範的建立與舊論述的排除的話，他在渡臺宣言中批評了漢人的固有知識與提及西方人記事對於臺灣種族現象的研究。在接下來臺灣人類學會的時代，進一步接合他所知的西方種族研究的知識，中文的文獻紀錄與田野中的民族誌資料，以新的語言，新的分類概念，新的文化演化觀，將臺灣的種族現象，重新翻譯、改寫成一套新的種族知識。十九世紀中分化出來的人類學知識成為他建構臺灣種族知識的普世性知識論依據，同時操作著類似的知識建構機制，以 Johannes Fabian 的話來說，即人類學在十九世紀以來在建構其知識上的他者時的「當下同一時間的否定」（denial of coevalness）。⁷⁵ 伊能的作法是，將文獻當成種族在歷史時期上的紀錄，而田野中的現象，則依據與文獻紀錄中相似性的程度，析分其是否是保持原狀的活化石，或是文化演化的程度。這樣的作法不但忽略了文獻所記錄的一方面只是特殊時空的現象，以及某種知識型運作下隱而未知的知識再現。另外也假定了人類社會特質在歷史發展中的穩定性與內部一致性，而這樣的穩定與一致的特性，是可以透

⁷⁴ 伊能嘉矩，〈陳余之赤志，訴於先達之君子〉，見伊能嘉矩，《臺灣志》，頁4；另見吳密察，〈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頁7。

⁷⁵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過「種族」這種人群單位加以辨識。同時更是假設了以這樣的知識分類單位被辨識出來的不同的種族，存活在普世預設的單一時間概念中的不同發展階段，「本然的蕃族」或被認為保持原狀的蕃族，變成文化發展未進化的古代原始種族在當代如化石般存在的活現。

今天我們或許不再使用演化的觀念來看臺灣的人類活動現象，也很少使用「種族」這樣的語言，似乎我們已經脫離了伊能嘉矩建構的種族所指涉的社會範疇，也脫離了十九世紀的演化觀中的西方中心的知識論預設。其間雖然經過了技術性的分類修正（森丑之助的批評可看成是這種技術性修正的之一），表現其命名的語言也經歷了日文至中文的語言轉譯，同時「番」或「蕃」的名稱（ethnonym）也早已被取代，甚至連「種族」幾乎都不再使用而改以在戰後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特別是1980年代末期至今）引進的「族群」（ethnic group）這樣的學術分析概念。然而，伊能所區分出來並假設其內部同質的「種族」單位，無論是在學術界的（例如：○○「族」的○○研究）、原住民運動中的（例如以「族」為單位的文化復振運動，結盟與權益爭取等運動）、民間日常生活中的（例如，在行政、教育、商業、觀光活動中在目前官方認定的原住民14「族」或是仍在爭取官方承認的其他更多的「族」），至今仍一直不斷地再生產。⁷⁶ 從這些活動來看，我們似乎仍籠罩在由伊能最初總其成的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自然史中種族知識的分類架構的陰影中——雖然學科專業的分析術語改變了，概念指涉的內容，也從本質化的生物或是文化特質的辨識，逐漸變成討論人群集體性的社會位置差異的歷史形成過程，但是作為一個相互排除的社會範疇的單位卻留下來了。一句話，內容改變了，形式（form）卻延續下來。

這樣的討論，似乎很容易得到一個結論，認為「種族」知識在臺灣的登場，在伊能嘉矩以前或之後，是臺灣的近代性形成的一部分。這基本上是本文的主張，但是，我們似乎需要更進一步將這樣的近代性的知識型加以問題化。在如何表述臺灣的人類活動據以構成的歷史發展、文化現象或社會形構等問題上，我們需不需要將「種族」知識當成是非歷史的客觀的「學術的」概念，合法化對於知

⁷⁶ 目前官方承認的原住民族一共有14族，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分佈〉，下載日期：2010年2月3日，http://www.apc.gov.tw/main/docDetail/detail_ethnic.jsp?cateID=A001917&linkParent=327&linkSelf=327&linkRoot=8。

識對象的切割？或是將這樣的知識也當成討論的對象，並進而探討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各種近代性的知識裝置，在臺灣的登場（包括西方的直接影響、或是捲入清帝國在十九世紀的變革，或是透過日本殖民時期的代理），所牽涉的跨語言實踐中，對於社會事實在物質上的與其知識再現上的改變呢？在這個過程中，是不是改變了對於原有事物秩序的認識，並同時也創造出了新的社會事實呢？一個在歷史發展中認知架構的斷裂現象，似乎也創造了我們今天所使用的一切描述事物的語言，甚至是構成我們集體心態的基本範疇，其被遺忘的近代起源。更進一步來說，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彙、概念，諸如「國家」、「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勞動」、「殖民主義」等等，以及這些概念所欲指涉或再現的社會事實，不也是這個近代性計畫的一部分？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在此回答這些問題。當然，個別的行動者、國家、政體、歷史情境，可能都是影響這些近代性轉變的重要中介者，但是，在區域歷史的討論上，我們似乎也必須時常自我提醒。這些概念，不論是已經被放棄的（如種族），或是正在使用中的，不單單只是學術研究的描述性或是分析性後設概念而已，概念本身，也擔負了其形成本身的歷史重量。因此，本文建議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些指涉社會範疇概念的歷史性以及其跨越區域的全球流通的狀況。在這樣的關懷下，透過分析「種族」這一全球概念在臺灣展開的歷史性，本文同時亦是摸索如何重新提問的一個「概念－歷史」取徑的嘗試。

附錄一、臺灣人類學會暫定規則

第一條	本會結合臺灣從事人類的理學研究的同志
第二條	<p>本會會員為達前條之目的，隨時從事左項之事：</p> <p>一、實地調查</p> <p>二、研究資料蒐集</p> <p> 第一、圖書蒐集</p> <p> 第二、標品蒐集</p> <p> 第三、語言及口碑彙整</p> <p>三、記述編纂調查研究結果</p>
第三條	本會會員由人類學及其他相關諸學科之篤志者組織之
附則	<p>一、從來於臺灣雖然分人類為漢人及熟蕃、生蕃三者，但是除漢人之外，僅視為異種人類，概不過從華夷之名中國古來習慣稱呼而已。故所謂熟蕃生蕃不可直接作為學術上之名辭，必須依據今後的研究結果，始能決定種族為何（或屬於同一種族，或分為不同的異種族，兼有之）。是以本會姑將其人類之類別，區分為如左二大目，以作為研究之問題：</p> <p> 第一大目 臺灣漢人的調查研究</p> <p> 第二大目 臺灣漢人以外的調查研究</p> <p>二、臺灣諸人類的調查研究，今日尚屬初步，勢先主以其資料之彙整不可，本會常置如左之六部門，各配當前條之二大目，便宜分任調查研究：</p> <p> 第一門 生物學的研究部</p> <p> 第二門 心理學的研究部</p> <p> 第三門 土俗學的研究部</p> <p> 第四門 語言學的研究部</p> <p> 第五門 地理歷史的研究部</p> <p> 第六門 宗教的研究部</p> <p>三、依據本則第二條第二項之旨趣，於本會內設置土俗標品室</p> <p>四、此規則所稱之臺灣，指臺灣本島及其附屬島嶼並澎湖群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 119 度到 120 度及北緯 23 度到 24 度之間諸島嶼</p> <p>五、凡於某地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必一併明瞭與其附近人類之關係不可，故本會雖以臺灣之人類研究為主，並及於附近諸人類之調查，此為勿論之事</p>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臺灣通信（第 2 回）臺灣人類學會〉，頁 149-151。

引用書目

- 「臺灣大學伊能文庫」, M035, 〈貂山冷水〉。
- 「臺灣大學伊能文庫」, M036, 〈クバアラワン志料〉。
- 「臺灣大學伊能文庫」, M040, 〈熟蕃資料〉。
- 「臺灣大學田代文庫」, t001, 〈土匪死屍下付願〉。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00116, 明治 28 年乙種永久追加第 2 卷 26 號, 「藤田捨次郎外八名「栗野傳之丞」「伊能嘉矩」國語學校教諭及書記 任命」, 2 門: 官規官職: 進退。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00180, 明治 30 年乙種永久保存, 第 36 卷第 2 號「撫墾署長諮問會議議事要錄」, 12 門: 殖産: 撫墾。
- Mackay, George Leslie (著)、周學普(譯)
1960[1895] 《臺灣六記》, 臺灣研究叢刊第 69 種。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不著撰人
1896 〈人類學會〉, 《臺灣新報》79, 1896 年 12 月 6 日, 第 1 版。
1896 〈雜報 臺灣人類學會〉,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3: 375-376。
1896 〈雜報 臺灣人類學會〉,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4: 419。
1898 〈本會發會式〉, 《蕃情研究會誌》1: 90。
- 五井直弘
1976 《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東京: 青木書店。
- 永山規矩雄(編)
1930 《田代安定翁》。臺北: 故田代安定翁功績表彰記念碑建設發起人。
- 永原慶二
2008 《20 世紀日本の歴史学》。東京, 吉川弘文館。
- 伊能嘉矩
1895 〈臺灣通信(第 1 回) 會員田代安定君の生蕃實查〉,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7: 94-99。
1896a 〈臺灣通信(第 2 回) 臺灣人類學會〉,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8: 149-151。
1896b 〈臺灣通信(第 3 回) 撫墾局〉,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19: 179-184。
1896c 〈大料崁(Toa ko kam) の蕃婦〉,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0: 228-230。
1896d 〈臺灣通信(第 4 回) 生蕃と熟蕃〉,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0: 224-228。
1896e 〈新店地方に於ける生蕃の實查〉,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1: 272-278。
1896f 〈臺灣通信(第 8 回) 北東部地方に於ける平埔蕃〉,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4: 384-389。
1897g 〈臺灣通信(第 18 回) 宜蘭方面に於ける平埔蕃の實查〉,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36: 373-378。
1898a 〈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開化の程度(蕃情研究會に於ける伊能の説)〉, 《臺灣新報》486, 1898 年 4 月 26 日, 第 2 版、《臺灣新報》489, 1898 年 4 月 29 日, 第 2 版。
1898b 〈臺灣通信(第 22 回) 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の分布〉,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46: 301-307。
1898c 〈臺灣に於ける土蕃の分類及び其の現在通有する開化發生の度〉, 《蕃情研究會誌》1: 2-15。

伊能嘉矩（編）

1902 《臺灣志》。東京：文學社。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

1900 《臺灣蕃人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書課。

多田綱輔

1898 〈臺灣動物調查〉，《東洋學藝雜誌》199: 168-176、201: 290-295、206: 506-510。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0 〈原住民族分佈〉，下載日期：2010年2月3日，http://www.apc.gov.tw/main/docDetail/detail_ethnic.jsp?cateID=A001917&linkParent=327&linkSelf=327&linkRoot=8。

吳文星

1997 〈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發表於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研討會，1997年12月18-20日。

吳密察

1997 〈臺灣大學藏「伊能文庫」〉，《大學圖書館》1(3): 4-23。

坪井正五郎

1900[1895] 〈蕃情研究の急務〉，《蕃情研究會誌》4: 64。

陳偉智

1997 〈殖民地統治、人類學與泰雅書寫：1895年田代安定的宜蘭調查〉，《宜蘭文獻雜誌》29: 3-28。

1998a 〈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東臺灣研究》3: 103-146。

1998b 〈知識與權力：伊能嘉矩與臺灣原住民研究〉，《當代》135: 28-51。

陳培桂

1963[1871] 《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淑均

1963[1852] 《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鳥居龍藏

1897 〈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び其分布〉，《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36: 378-410。

森丑之助

2000[1913] 〈生蕃對臺灣島的影響及臺灣蕃族學術調查〉，收於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頁527-529。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南郡（著），笠原政治、宮岡真央子、宮崎聖子（編譯）

2005 《幻の人類学者森丑之助：台湾原住民の研究に捧げた生涯》。東京：風響社。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18 《理蕃誌稿 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

Chen, Wei-chi（陳偉智）

2001 “‘The Natural History of Formosa is as Yet an Unwritten Book’: Missionary, Natural History and Local Knowledge in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0th Annual MAR/AAS Conference, Slippery Rock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n, Fa-ti (范發迪)

2004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rber, Paul Lawrence

2000 *Finding Order in Nature: The Naturalist Tradition from Linnaeus to E. O. Wils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no, Kakyo (伊能嘉矩)

1899 "Die Wilden Staamme von Formosa, ihre Einteilung und ihr Kulturzustand."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von Erdkunde in Berlin* 34: 63-74.

Liu, Lydia (劉禾)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kay, George Leslie

1895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Pratt, Mary Louise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Sartori, Andrew

2005 "The Resonance of "Culture": Framing a Problem in Global Concept-Hist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7(4): 676-699.

Taylor, George

1889 "Formosa: Characteristic Traits of the Island and its Aboriginal Inhabitan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f Geography* 11(4): 224-239.

1999 *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and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Wallace, Alfred Russel

1998[1881] *Island Life*.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Wallerstein, Immanuel et al

1996 *Opening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Modern Taiwan: Local History with Global Concept

Wei-Chi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folding of modern knowledge of race and racial classification in Taiwan. Ever since natural history became a discipline of study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race has emerged as a global concept of universal human classificati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diverse human societies as a discipline began with natural history and evolved into branches of human science, namel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human diversity had also changed its focus from identifying distinctiv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taloging human taxonomic units to analyzing the social functioning of human groupings. Although participants i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race carried with them various purposes, such as evangelization, commercial or political interests, they all re/present the societies under study using race, or other concepts of human unit derived from it.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iverse local human societies of Taiwan were classified and categorized within the global knowledge framework of race by naturalists, missionaries,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scientific claim of race knowledge in Taiwan made by missionary-naturalist George MacKay and anthropologist Ino Kanori had excluded other represent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Despite of the emergence of other concept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human society, race still remains nominally a social unit for identification and distinction.

Keywords: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y, George Leslie MacKay, Tashiro Yasusada, Ino Kanori, Mori Ushinosuke, Race, Social Classificatio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Global Concept

